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末。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中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階段，1980 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本特徵——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¹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 年 5 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479 頁。

序

/ 牛 軍

郝江東博士的著作《來自中下層的「革命」：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軌（1945—1949）》（以下簡稱《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終於出版了。我作為郝江東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指導老師，像以往一樣，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賀。

本著作是郝江東在他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幾年的修改而成。在我看來，本書的出版既反映出郝江東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取得的明顯進步，也會成為他未來學術生涯的一個新起點。與郝江東和其他我指導過的博士生一樣，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就是博士論文。我不斷告訴博士研究生這些經驗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勵他們能挺過寫論文的煎熬，也希望他們能從老師們的經歷中有所借鑒、對導師的言行和要求有所理解與諒解。畢竟，從確定題目到收集歷史檔案、參加學術交流，再到最後通過答辯，博士生們除了付出非常辛苦的努力，還要經受很大的精神壓力。現在看到郝江東和他的同門同學們陸續走上教學研究崗位，並能不斷取得新成果、作出新貢獻，我作為導師很願意與他們分享各種收穫和快樂。

我在為之前的學生們出版著作寫序時就表達過，我把寫序言當作自己盡師生之誼的一個機會。我在指導包括郝江東在內的博士生們寫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和啟發。直到現在，我還不斷從他們那裏獲得很多幫助，並且越來越意識到，將來在獲取信息和新發現的歷史檔案、了解學術動向等方面，將對他們產生更加嚴重的依賴。不過，除了表達祝賀和盡師生情誼，我接受郝江東的邀請寫作這篇序言，也是希望藉此談談《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學術上的貢獻所在，畢竟我自己也

認真思考過這個選題的價值，並與郝江東有過多次交流以理解他的思路。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一書的研究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49年初的蘇聯對華政策。這當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但郝江東的確通過他的研究有了新的發現，並提供了新的解讀，我認為其內容對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是有重要啟發的。近些年來，我的論文和講座通常會用「再思考」作為題目，意即對以往本人或同仁研究過的課題作新的探討。這首先是因為近些年來大量新的歷史檔案不斷被挖掘出來，有些史實需要進一步訂正或補充。其次，或許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解讀相關歷史過程，包括深入挖掘其中的含義，從而豐富對歷史的認識。做這類研究涉及到中國外交史研究領域未來發展的一個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需要儘可能多地學習、掌握和運用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方法等。這樣做會大大有助於強化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並可使研究成果更加深化和精細化。《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這方面可看作範例，這首先表現在作者明確地將研究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關注點從最高決策者斯大林，轉向了蘇聯外交決策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通過研究論證了「蘇聯對華政策的決策機制並非鐵板一塊，常常呈現出一種複雜與隨機的狀態」，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所謂斯大林的決定性作用主要體現為他在這些中下層機構所建構的對華關係格局的基礎上作出了最終決定」。從本書敘述中可以看到，戰後初期莫斯科決策層並沒有持續地重視中國問題，這也成為導致這個時期蘇聯對華政策呈現出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若不充分、細緻地探討和揭示蘇聯決策機制的特點及其與蘇聯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之間的關聯，對戰後到1949年初蘇聯對華政策發生轉軌這個歷史過程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研究視角的改變為觀察和分析拓展出了新的空間。讀者首先可以作合理設想，對於蘇聯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然大國，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根本就不可能每時每刻並同等地關注和重視這個國家在每個方向上面臨的每一重要事態，儘管這類領導者有時的確具有超人的精力和能力，而斯大林的確又是這樣的歷史人物。那種基於對高度中央集權國家的決策體制和最高領導

人必定主導一切的篤信和由此導致的一般性觀察和理解等，通常會使研究者將觀察視角過度聚焦於最高決策者，將該國家的對外政策和行為同最高領導人的看法和選擇直接掛鉤，似乎找到若干有關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檔案（包括機密的），就足以解釋那些紛繁複雜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有時情況的確如此，不過這絕不能代替對歷史事件的具體分析，諸多複雜的因果關係仍然不是因此可以不證自明的。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一項政策及政策執行者的行為等，都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可以看到來自最高層的決定也會是如此。更值得重視的是，在最高決策者並沒有確切指示的情況下，有些局部地區的政策至少看上去還是有條理、有邏輯的。《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重要價值就是針對這種情況，嘗試提供對蘇聯戰後初期對華政策的新敘述和新解釋，而作者對戰後初期蘇聯對東北政策的分析的確證明了本書的核心觀點，從而也突顯了以往研究的粗疏之處，即沒有揭示出蘇聯對華政策的複雜性甚至其表現出的某種混亂也根源於蘇聯外交決策體系的基本特點這個基本事實。

作者指出，戰後初期，在諸多地區事務的演變過程中，「莫斯科決策層對問題的了解常常落後於當地形勢的發展」；至於在中國問題上，這種滯後的部分原因恰恰是，「截至 1948 年底，莫斯科決策層並沒有給予中國問題持續、充分的關注」。正是由於斯大林沒有特別和持續地關注對華政策，決策體系中的其他角色便掌握了表演的空間，由此造成蘇聯決策體系中的「中下層機構在面對複雜形勢時經常缺乏統一、持續與及時的指示，在理解自身責任時擁有較大的空間，採取的行為通常具有隨機性」。

戰後初期各方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博弈特點等，對於理解作者的上述判斷是很有幫助的。《來自中下層的「革命」》比較清晰地勾勒出蘇聯處理對華關係決策系統的複雜性。根據該書的敘述，至少要確切觀察和把握幾個方面的因素，才能理解蘇聯對華決策機制的複雜性，包括決策中樞莫斯科、駐重慶的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東北蘇軍統帥部，等等。如果更細緻地觀察，在莫斯科的系統除了斯大林本人，還有外交部和蘇軍總參謀部等；前者直接對應的是駐重慶的蘇聯使館，後者則直接指揮着在東北的蘇軍司令部。需要詳細描述和解讀的是，這麼複雜的結構是否在每時每刻都在協調行動？包括即使

假設斯大林能夠隨時給予指示，外交部和總參謀部是否都能及時、準確地給予同樣的理解並加以貫徹呢？《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顯然提供了一個否定的答案，這與以往的研究是不同的。

如果換個角度進一步觀察，作為蘇聯政策的被施予者，中國的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等在東北地區的決策同樣都有複雜的內部結構問題。從國民政府方面看，在重慶的權力中心是蔣介石，周圍的機構還有外交部（部內還存在複雜的人事變動和糾葛）、軍隊指揮機構和駐華美軍司令部。國民政府在東北還設立了專門的「行轅」，其中還有負責與蘇軍交涉的專門官員和指揮軍隊的司令官等。國民政府在重慶保持同莫斯科的交往，東北行轅則同東北蘇軍和蘇外交部派駐東北的專門官員打交道，等等。中共方面的情況甚至更複雜。中共中央在延安指揮包括東北在內的全局，在東北地區則很快設立了統籌領導東北地方鬥爭的東北局，在重慶還有周恩來領導的談判代表團。中共與蘇聯的直接交往，最初就是進入東北的軍隊，後來是東北局等機構與駐東北蘇軍之間的聯繫；國共談判恢復前後，中共駐重慶代表團與蘇聯駐華使館之間保持聯繫；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描述，他們之間的交往最初次數不多，而且內容泛泛，蘇方代表更多時候是用外交辭令來敷衍中共代表表達的關切。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使館人員的態度明顯改變，這無疑反映了蘇聯有關政策的變化。

上述方方面面的每一方都很複雜，但也不過是一幅拼圖的一片，只有將它們合理地拼接在一起，才能看出東北地區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構全貌。重要的是，進行這種更為系統的敘述，是在向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挑戰，而那種只依據有關最高決策層的歷史文件敘述的因果關係鏈條顯然過於簡單了，無法對如此豐富而複雜的事態提供有足夠說服力的解釋。對於莫斯科的最高決策者和龐大的決策系統來說，應對上述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本來就很不容易，更何況斯大林本人的主要關注並不在東方。如果排列一個年表，或可大致呈現莫斯科真正的關注所在和斯大林到底用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來應付中國急劇變化的形勢。例如，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考察，蘇聯在 1945 年 12 月就向延安派出聯絡人員，但是中共中央並不能通過他們同莫斯科

直接溝通在東北地區的政策和行動，中共領導人仍然需要通過東北局和重慶代表團來獲得有關蘇聯政策的動向，而那些信息有時是相互矛盾的。

顯然，如果不深入考察和理解圍繞東北地區多方互動的結構性問題，便無法說明蘇聯政策何以呈現出如此多令人費解的現象及其對其他各方的影響，包括對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處國共失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等等。作者利用發掘的新資料，通過敘述這個變化過程，揭示了蘇聯政策的變化及其對當時進行中的國共談判的影響，從而對以往相關的研究成果作出重要補充。不過還是要說明，書中的確有大量基於新歷史檔案的描述，當然也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畢竟，窮盡各種細節對於歷史研究是永遠不可實現的要求，這也是歷史文學的作品往往更吸引讀者的一個原因，因為作者可以不受歷史研究規範的約束，用自己不經證明的想像來填充那些空白。

基於以往的有關分析，《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進一步深入考察了斯大林「將東北問題置於地方層面解決的策略」，並指出正是這個策略客觀上加強了「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對中蘇關係互動的影響」。這個研究視角和判斷推動作者下了相當大的功夫去收集有關的蘇聯檔案並有相當可觀的收穫。當年的蘇聯外交官曾經回憶，戰後初期的蘇聯對華政策出現了「在上層是一種性質，在中層和下層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古怪情況¹。作者利用豐富的歷史文獻證明，在以高度集中為主要特點的蘇聯決策體系中，當時莫斯科決策層對中國事務的「忽視」，以及斯大林本人將東北問題「地方化」的策略等因素，是導致那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戰後初期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的複雜互動中，許多「蘇方」決策與行為並非「上層」決策者（即莫斯科決策層）主動啟動的進程，而是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職業外交機構或其他涉外機構根據他們的觀念和理解「意外塑造」出來的結果。

以往的研究大致證明，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更多地體現了俄羅斯傳統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等觀念的影響。冷戰的爆發難免賦予蘇聯對華政策更

複雜的含義，而將對華政策置於冷戰體系中加以思考和處理，對於蘇聯領導人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對1946—1947年蘇聯對華政策的敘述是另一個很有新意的部分。以往的研究成果對這個時期蘇聯的對華政策着墨不多，不論是描述還是分析，差不多都是空白的。這本書利用新發現的歷史資料，提供了新的解釋，即1946年春季開始日益激化的美蘇對抗和由此導致的蘇聯對外政策的明顯轉變，並沒有立刻反映到莫斯科的對華政策上，但對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造成了衝擊。換句話說，冷戰對蘇聯對華政策的影響過程是自下而上的。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基於對蘇聯式決策體系的體驗，它是有合理性的，其理由對於經過專業學習的中國讀者來說，不需要太多解釋。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認為，莫斯科在對蘇聯利益與安全攸關的歐洲局勢日益緊張時，最初並不打算在遠東地區挑起新爭端。問題是冷戰對立導致蘇聯中下層機構在處理對華事務時的態度發生重要變化。這一方面體現在那些機構在向莫斯科提交的報告中，對國民政府的定性和話語系統大大改變；另一方面則是他們不斷強化反對國民政府的立場以及明顯深化同中共在東北地方層面上的戰略性互動。作者以中蘇圍繞東北經濟問題的談判為重要案例，說明蘇聯同國民政府關係惡化的複雜原因，以及這種惡化如何在冷戰背景下變成了美蘇鬥爭的組成部分，並因此成為東北蘇軍決心更有力度支持和援助中共的重要推動力。在這種互動中，即使沒有冷戰，蘇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會更好一些嗎？解答這個問題對於理解冷戰在中蘇關係中到底起了什麼作用，是有意義的。畢竟，早在杜魯門主義出籠之前，東北蘇軍就開始更積極地支持中共軍隊，利用他們破壞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

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在馬歇爾使華後取得第一個成果即1946年1月10日推動國共達成《停戰協議》之際，東北蘇軍代表就告訴國民政府代表，蘇軍部隊將無法按時撤軍，而且不會阻止中共軍隊在東北北部地區的行動。1月16日，蘇軍還拒絕國民政府接收九台礦區，同時嚴禁東北國民黨軍隊調動，警告後者在東北的「任何武力行動，須先通知蘇方」。1月31日，蘇軍代表同中共本溪代表簽署協議，決定將南滿「蘇家屯以南到營

1 [俄]A.M.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頁。

口、安東，東至通化，包括一千餘萬人口的重工業區」交由中共部隊接收。第二天，蘇軍正式通告國民政府以供煤不足為由，拒絕國民黨軍隊使用中長鐵路。2月23日，駐東北蘇軍代表甚至敦促中共「再增強東北幹部，大批增調主力部隊到東北」。根據這些事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東北蘇軍的行動是導致停戰協定在東北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問題是他們的這些行動與莫斯科的政策是一致的嗎？如果比較作者對該時期莫斯科對蘇聯駐華使館的指示，至少可以確定，東北蘇軍的上述行動與莫斯科的指令是不協調的。正如作者指出的，斯大林固然沒有料到中蘇圍繞東北經濟談判會產生如此糾葛，但並沒打算因此改變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然而，駐東北蘇軍這時不僅幫助中共在東北迅速發展，致使後者的實力不斷擴充並在東北逐漸擁有了需要維護的現實利益。東北蘇軍的行動最終塑造了他們與中共之間的「戰略性關係」，這對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產生了深遠影響，即為1949年初蘇聯對華政策轉軌「埋下了伏筆」。

比較國共雙方這一時期對蘇聯的政策也是很有價值的，畢竟中蘇各方的互動也是推動蘇聯對華政策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首先，探討蘇聯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的作用時，必須重視來自中共一方的主動性。作者認為，中共的成功之道在於憑藉意識形態與歷史因素的天然有利條件，在搶先進入東北後「贏得了蘇軍的好感」，而他們積極推動與當地蘇軍的合作是導致東北局勢演變的關鍵動力。反觀國民政府，其最大失誤就是將此間蘇聯對華政策的決策機制視為「鐵板一塊」。雖然負責對蘇交涉的國民政府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也認識到，「蘇方對於東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但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主要決策者仍將駐東北蘇軍的行為完全等同於莫斯科的意圖，處理對蘇關係的基本思路是將東北問題國際化，利用「大國政治博弈對莫斯科決策層施加壓力」，結果惡化了中蘇關係氛圍，強化了「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的基本立場。

冷戰爆發對蘇聯對華政策的影響是學術界持續關注的重點，《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這方面不會是例外。蘇聯政策在冷戰爆發的背景下發生的變化，對馬歇爾調處的成敗和持續進行中的國共談判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美

蘇關係的惡化同國共關係的惡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等等，已經被學術界證明了。《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利用新發現的俄羅斯檔案，更有力地證明了在冷戰爆發的背景下，蘇聯直接針對馬歇爾調處所採取的行動，特別是給予中共方面的支持。這首先表現在蘇聯駐華使館對馬歇爾調處日益公開地表達出強烈的反對態度。其次是向中共方面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外交支持。第三是在中國東北地區，蘇軍撤出後，蘇聯地方機構與中共當地機構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日益密切，並「越來越具有實質性意義」，雙方於1946年春形成的「戰略性關係不斷得到鞏固」。作者認為，蘇聯的行動改變了國共力量「在東北戰場乃至全國內戰中的根本走勢，還打亂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設想，讓美國失去了增加在華影響的機會」。

從後來發展的情況看，中共中央在這個階段開始主動發展同莫斯科的聯繫也是至關重要的。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1945年底1946年初，斯大林向延安重新派出了聯絡員（即蘇軍少將奧爾洛夫醫生），並通過這一情報渠道直接指示中共中央接受馬歇爾調處，下決心停止內戰。但這種聯絡渠道的恢復同樣為中共中央直接影響莫斯科的政策提供了方便。中共領導人在指示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主動接近蘇聯駐華官員的同時，也通過駐延安蘇聯聯絡員直接給斯大林寫信，詳細匯報了中共中央這一階段的戰略方針、策略選擇、軍事實力等問題，「甚至還就極為機密的中共中央領導層的人事問題與自己的健康問題作了匯報」。當然，從莫斯科到蘇聯大使館，對中共中央主動靠攏的行動反應消極。直到1947年春夏，當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莫斯科與延安建立的直接聯絡渠道顯示出獨特的重要性。當斯大林開始關注並有意於對華政策「轉軌」之時，他就可以通過這個渠道直接與毛澤東聯絡，並了解、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和行動。

這個時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另一個方面，是受到蘇聯與國民政府關係持續惡化的衝擊。冷戰的爆發使諸多國家或政治勢力都面臨「選邊站」的局面。蘇軍撤出東北後，莫斯科一度延續了戰後初期的對華政策，斯大林釋放了一系列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係的信號。問題是此時國民政府更願意、也很相信能得到來自美國的援助，基本原因就是學界已經多次陳述過的那些，其結果

也不難推斷。《來自中下層的「革命」》根據新挖掘的俄羅斯檔案，明確指出了莫斯科對國民政府政策轉變的時間大約在 1946 年 7 月間。7 月 25 日，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首次明確表達了對馬歇爾調處工作的不滿。作者認為這標誌着蘇聯對馬歇爾調處的態度發生「根本轉變」。這個轉變發生在中國全面內戰爆發之際。之後不久，即 8 月 10 日，馬歇爾發表聲明承認調停失敗。究竟該如何確定這一連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對中共中央戰略的直接影響等等，還是有很大想像空間的。例如作者對這個時期蘇聯方面提供的戰略和軍事情報等對中共中央戰略與策略影響的論述，不論是史料還是判斷，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這方面值得重視的是基於《來自中下層的「革命」》設定的視角，作者繼續深入闡述了蘇聯駐東北地方機構繼續發揮着特殊的作用，他們的行動有時是超越莫斯科授權的，並因此受到來自莫斯科的批評和節制。作者以旅順大連地區蘇聯行政當局為例，敘述了他們一方面繼續阻撓國民政府的接收行動，這最終導致國民政府方面對中蘇關係幾乎絕望；另一方面，他們給予中共方面各種支持和便利，有些甚至超出了莫斯科的授權。例如在 1947 年夏季，蘇聯輪船就經大連港幫助中共向山東地區海運人員和物資，通常是「滿載軍火」駛向山東解放區，「回程裝運糧食」。這一情形後來被國民政府發現並提出外交交涉後，時任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不僅予以「嚴厲批評」，而且指示「絕對禁止」蘇聯船隻駛往煙台。一系列的個案證明了作者的如下觀點：「相較於莫斯科決策層的謹慎與保守，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往往更為激進」，而這部分是因為在冷戰爆發的情況下，他們與莫斯科面對的國際大環境或許沒有根本不同，但所面臨的具體情況如增多的美軍機偵察飛行等等，是莫斯科難以感受到的。

關於蘇聯對華政策「轉軌」的時間點，作者認為是在 1948 年 11 月，即在中共完全控制了東北並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態勢「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之際。這前後的歷史進程已經有諸多論述，基於《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主線，作者強調了中共控制全東北的重要影響，認為這導致「蘇聯與中共在東北地方層面的互動及其間的戰略性關係漸漸超出地方層面，開始引起

莫斯科決策層的關注」。這個判斷還可以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加以檢視，並尋找更多的歷史證據加以闡述。1948 年春夏，斯大林已經開始與毛澤東有直接電報往來。他採取這個行動正是基於變化中的蘇聯對中國內戰前景的判斷，特別是他希望一旦中共獲勝便能選擇在冷戰中站到蘇聯一邊。記得我在為之前一位博士的著作寫序言時說過，現在做的研究有時就像是在「拼圖」。研究者往往會盡其所能地將更多的碎片準確地安放在歷史框架中，力求更準確和完整地呈現歷史畫面的原貌。不過通常的情況是，隨着更多的碎片被更準確地放置到位後，空缺的地方反而更加顯眼。做歷史研究的人恐怕會永遠糾結於自己的努力帶來的這種效果，然後繼續埋頭苦幹下去。

在讀完全書後想說句題外話。《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雖然是從研究蘇聯對華政策演變的視角展開敘事的，但其內容和突出的特點對於理解和研究其他超大型國家的對外政策也是很有啟發的，也有助於推進對其他類似歷史事件的研究。研究對外決策理論的政治學界可以更關注這類歷史研究成果中揭示的越來越清晰和具體的個案，如果對涉及各方的結構做更深入的分析，很可能會獲得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層次的認識。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出版是郝江東博士學術生涯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他對這個領域研究的一個新貢獻。我相信郝江東會從完成這本書的艱苦努力中獲得成就感，也會增加新的動力去開拓新的領域。由衷地希望郝江東和他的同伴們繼續努力，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在這個年代願用「梅花香自苦寒來」與郝江東博士共勉。

目 錄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i
序 / 牛 軍	iv
第一章	001
緒 論	
第二章	042
大國協調與秩序重建	
第三章	094
「拒蔣迎共」	
第四章	159
「鐵幕」下的抉擇	
第五章	225
轉軌時刻	
結 語	262
參考文獻	269

第一章 緒 論

一、問題的提出

本書目的在於通過揭示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探討蘇聯對華政策在 1949 年 2 月發生轉軌的原因。

本書考察的時間段是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2 月。通過 1945 年 2 月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祕密協定」與 8 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構建起二戰後初期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他選擇了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結成同盟的方式，來實現蘇聯在華一系列現實利益訴求。中國共產黨則是不受重視的一方。與國民黨政府簽約後，中國問題在莫斯科決策層議事日程中的緊迫性迅速下降。至 1947 年底 1948 年初，隨着歐洲冷戰的爆發與國共內戰形勢的根本轉折，莫斯科開始重新關注對華政策問題。1949 年 2 月，斯大林派遣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А.И. Микоян）祕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中共最高領導人就雙方當時認為最重要的歷史、內政、外交問題舉行會談並達成了共識。

米高揚祕密訪問西柏坡標誌着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發生根本轉軌。本書所謂「轉軌」主要包括三層涵義：第一，相對此前在局部地區援助中共的策略，斯大林開始從國際層面重新思考對華政策問題，並且第一次表明支持中共取得全國性勝利、建立全國性政權的立場；第二，斯大林正式認可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運動，確認這場革命運動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提出讓中共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的問題；第三，基於以上兩點，斯大林開始重新思考中蘇結盟問題，提出重簽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重新為中蘇關係奠定基礎。由此，本書將1949年2月米高揚祕密訪華視為蘇聯對華政策轉軌的標誌，即斯大林將蘇聯對華關係的對象由國民政府完全轉向中共，開啟了同中共結盟的進程。

本書研究的是一個老問題，研究時段距離今日超過了半個世紀，各方檔案、史料、文件以及見證人的傳記、日記等已經大批解密和出版，學術界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隨着文獻與資料的不斷公開，歷史環境、意識形態等因素的變遷以及新的觀察解讀視角的應用，目前關於這一問題的探索不斷出現全新的面貌與不同的答案。近些年來出現的不少新的文獻與資料還表明，1945年8月至1949年2月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及最終發生轉軌的過程遠較以往研究所揭示出來的要複雜得多。其中特別應該注重並有必要重新審視蘇聯外交決策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¹對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到底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而以往在中蘇關係與冷戰架構中的宏觀分析，以及專注於斯大林這樣的領袖人物的研究，很可能忽視或低估了這些中下層機構在歷史中的真實作用。

對莫斯科決策層²的過分關注、對決策進程的過度抽象和概括，以及對中下層涉外職能部門作用的過於忽視，是以往研究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以斯大林為首的莫斯科決策層擁有蘇聯對外政策的最高決策權，但由此認為只要研究斯大林等人的言行就足以理解蘇聯對外行為的根本邏

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斯大林這一時期那些為數不多、時斷時續的論述並不足以用來解釋蘇聯對華政策的連貫性及這一政策出現轉變進程中的許多現象。須知，外交決策不總是由最高決策者們主動啟動的，也有可能是職業外交機構或其他涉外機構根據自身價值觀和自己對政策的解讀意外塑造的結果。若不充分、細緻地探討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決策機制的複雜性，重新審視蘇聯外交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發揮的作用，對1949年初蘇聯對華政策發生轉軌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

本書目的即在力圖彌補上述不足，從蘇聯外交決策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中下層機構入手，重新探討蘇聯對華政策在1949年2月發生轉軌的原因。

二、文獻綜述

對於本書提出的這樣一個老問題，學術界曾長期關注並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近年來，隨着大量歷史檔案資料的陸續公開，學術界重新探討了這一問題，並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這些新出現歷史檔案與富有啟發意義的研究成果，是本書繼續研究的重要基礎。然而，在現有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中，專門以蘇聯對華政策作為研究與分析主線的還很少，絕大多數研究仍以中國革命史為主線，側重描述1945—1949年間中共革命戰略與策略的演變、國共內戰的起源與發展同以美蘇為主導的國際環境變遷之間的關係，強調中共與蘇聯走向結盟的歷史必然性。此外，受到時代環境、意識形態、研究視角、檔案資料以及研究者個人立場等因素的制約，許多研究成果存在着明顯的局限性，甚至有史實上的錯誤。

1 本書所提負責處理對華事務的蘇聯中層機構，主要包括蘇聯外交部（МИД СССР）、國家安全部（МГБ СССР）、蘇聯武裝力量部（НКВС СССР）（1950年改稱「國防部」）、蘇聯內務部（МВД СССР）等等。下層機構主要指這些中層機構下屬的駐華機關，主要包括駐東北蘇軍、駐華使領館、貿易機構等等。

2 本書所提「莫斯科決策層」，係指戰後蘇聯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在1945年8月至1949年2月間，「莫斯科決策層」主要由斯大林與他信任的數位蘇聯高級官員組成。

主流的解釋與分析觀點：基於對遠東與在華現實利益的視角

沈志華教授認為，1949年斯大林調整對華政策是一項「被迫的選擇」。他認為，在二戰後初期，影響斯大林對華政策設想的主要因素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和蘇美在亞洲的戰略關係」¹。中國共產黨最初只是「在需要時可以利用的棋子」，只是，由於「美蘇冷戰對抗的國際格局」、中共軍事上的勝利以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態勢，致使斯大林被迫讓步，基於自身遠東戰略利益需要尋求調整對華政策，因而開啟了與中共的結盟進程²。沈志華教授還追溯了歷史上沙俄在遠東的擴張傳統，梳理了斯大林對二戰後遠東地區秩序所持立場的歷史根源，認為獨佔中國東北是二戰後蘇聯遠東戰略的核心訴求，斯大林的根本目的是「保證蘇聯在東北的特殊權益」，對美國勢力進入中國東北的擔憂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選擇中共並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方式與程度³。

德國學者迪特·海因茨希教授同樣指出斯大林在同中共結盟問題上的「艱難」抉擇，稱結盟進程是在「衝突不斷發生的情況下產生的」。影響斯大林的因素，一是同中共「不同的現實政治利益」；二是同中共合作有可能背負「違反雅爾塔協定的風險」，尤其是，「避免出現美國實行偏袒國民黨的軍事干預」。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指出，莫斯科對中共政策出現變化，是在1948年底，背景是中共取得的軍事勝利以及蘇聯同西方的關係日趨緊張，斯大林「為加強其實力地位開始要把取得最後勝利的共

產黨中國變成蘇聯的同盟者」¹。楊奎松教授認為斯大林的基本目的就是將中國東北變為蘇聯勢力範圍。在不斷加劇的美蘇對抗形勢下，出於對美國與國民政府的不信任，斯大林自1946年2月開始便「不顧外交條約，還美蔣以顏色」，為中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²。

韓國學者金東吉教授認為，斯大林思考對華政策的核心訴求仍是現實利益，為要「保障蘇聯在中國已確保的特權」。正是基於對利益的考量，斯大林最初並沒有支持中國革命運動，而是選擇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合作。只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的一系列傾向於美國的政策，如大量的美軍繼續駐紮在中國、利用美國海軍和空軍運送物資和軍隊到東北」，促使斯大林改變政策，在中國東北以共產黨來牽制國民黨。整體上，直到1948年底，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支持中共的政策目的都只是「牽制當時實力上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同時提高蘇聯同國民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1949年初中國革命運動即將迎來的最終勝利，「迫使」斯大林重新調整對華政策。在金教授看來，斯大林調整對華政策的行為本身，同時包含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的意圖。³

國際體系的解釋

牛軍教授從美蘇全球冷戰的視角，指出戰後初期蘇聯的遠東戰略是防禦性的，此後這一戰略的出現變動，主要動因不是國共內戰的走勢，

1 沈志華撰：《無奈的選擇：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1944—1950）》，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2 沈志華著：《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沈志華撰：《被迫的聯盟：斯大林與中共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崔丕、[日]青山瑠妙主編：《多維視角下的亞洲冷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版。

3 沈志華撰：《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北京：《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 [德]迪特·海因茨希著，張文武等譯：《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見：Dieter Hein 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New York: M.E.Sharpe, Inc, 1998.

2 楊奎松撰：《美蘇冷戰的起源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北京：《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金東吉撰：《蘇美在遠東的角逐與斯大林世界戰略的調整——兼論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張海鵬研究員），2005年4月。

而是美蘇已經爆發的冷戰，受到在世界其他地區同對方關係的牽制。¹ 當然，牛軍教授也指出東北問題的重要性，認為正是避免出現美蔣控制中國東北的考慮，使得「戰略關係成為在東北聯結中共與蘇聯的關鍵因素」²，但由此導致結果則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獲得了穩固的地位」。這一結果不僅成為「改變中國革命力量長期被包圍的戰略態勢的起點」，還是「改變戰後遠東地區國際格局的起點」³。在中共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背景下，意識形態、未來中共的建政及其內外政策「將在東亞造成何種新的國際秩序，以及蘇聯的利益在其中能否和如何得到保障」等，都開始成為斯大林認真思考的問題，促使他「開始考慮進一步加強與中共的關係」⁴。

薛銜天和張盛發對二戰後初期國際環境的變化更為關注，將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納入當時蘇聯整體對外戰略轉變的軌道進行觀察。⁵ 薛銜天認為，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開始於1946年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在1947年下半年完成了「質」的轉變。美蘇在歐洲冷戰的爆發與不斷升級、「東西方形成了對抗體系和對抗機制」，共同構成了斯大林選擇中共並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的基本動力。⁶ 張盛發研究員認為歐洲冷戰的爆發是推動斯大林調整對華政策的主要動力。正是在1947年，斯大林最終

放棄了二戰後初期採取的「大國合作」的外交戰略，在遠東則體現為不再「勉強維持」在雅爾塔框架內的美蘇戰略合作，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由「消極冷漠」轉變為「積極支持」。他還提出，彌補由南斯拉夫離去產生的盟友空缺是斯大林援助中共的重要考量¹。

復旦大學丁常昕的博士論文《從緩衝區到結盟：新中國成立前後蘇聯對華政策》，探討了二戰結束到新中國成立蘇聯對華政策「發生改變的過程，推動這種轉變的動力以及這種動力與俄羅斯傳統歷史上的外交目標的關係」。作者將研究時段延伸到了朝鮮戰爭，細緻考察了朝戰期間「中蘇軍事同盟的運作」，得出如下結論：1947年蘇聯國家戰略的轉變（從「一國建設成社會主義」戰略轉變為「兩個陣營」的戰略）促使其對外戰略發生「根本性的調整」，基本目標從「緩衝區」轉向「結盟」。作者還從俄羅斯傳統對外政策講起，並援引喬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聯盟觀念」（Alliance ideology）概念解釋蘇聯與中共的結盟。然而，宏大的分析框架、刻板的理論套入致使其邏輯論證缺乏充分說服力。²

關於意識形態的視角

此外，一部分學者關注意識形態的作用。陳兼將這一因素視為中共與蘇聯同盟之路的基礎³。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甚至將1946年年中爆發的國共內戰視為美蘇在中國的一場「代理人戰爭」，稱這場戰爭不僅標誌着美蘇領導人開始將中國內戰與美蘇在歐洲和中東的利益衝突聯

1 牛軍著：《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2 牛軍撰：《從開羅到萬隆：戰後東亞秩序的緣起（1943—1955）》，長春：《史學集刊》，2015年第6期。

3 牛軍撰：《戰後初期美蘇國共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鬥爭》，北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 牛軍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蘇國共關係》，北京：《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 對這一時期蘇聯對外戰略的探討，可參考：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此外，俄羅斯學者 Егорова Н.И. 和 Чубарьян А.О. 主編的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5-1963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冷戰：1945—1963年，歷史回顧）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3 г. 一書，則集中反映了俄羅斯學術界有關戰後蘇聯與冷戰關係研究的主流觀點。

6 薛銜天著：《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

1 張盛發著：《斯大林與冷戰（1945—195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 丁常昕撰：《從緩衝區到結盟：新中國成立前後蘇聯對華政策》，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有關意識形態與蘇聯冷戰關係的論著，還可參考：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97.